

# 泛索马里主义的历史渊源与流变\*

## ——兼论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

王 涛 赵跃晨

**内容提要** 索马里人共同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化信仰,殖民瓜分对索马里人的冲击,反殖民主义斗争对内部认同的强化共同孕育了泛索马里主义。1948—1960年,泛索马里主义主要以反欧洲殖民主义为旗号,诉求是初步建立一个局部统一的索马里人独立国家。1960—1969年,它又以反“邻国殖民主义”为旗号,试图同时达成内部整合与外部扩张的双重目标。1969—1978年,泛索马里主义被嫁接到“科学社会主义”之中。1978—1991年,泛索马里主义回归到氏族主义层面,重新建构自身的理念与实践基础。1991—2012年,泛索马里主义借助伊斯兰主义的力量,试图以共同的宗教调和各氏族间的差异,通过常规武装斗争消除索马里人的内在分裂。2012年以来,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相关联,试图以非常规恐怖袭击为手段达成所谓“大索马里伊斯兰国”的目标。对象都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嬗变。泛索马里主义既有民族主义的表征,又展现出反民族主义的跨地区文化主义特性,甚至与恐怖主义也产生了联系。不过,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只是一种相互借势、各取所需的关系,前者有其文化合理性因素。

**关键词** 泛索马里主义 索马里人 大索马里国家 民族主义 伊斯兰主义 恐怖主义

跨界民族主义是二战后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背景下衍生出的一种“民族统一主义”的特殊形式。它的主要表现是在相邻两个或多个国家间跨界而居、具有同一民族认同的群体在强调本民族利益与特性的基础上,追求与现有国家分离、超越现有国界、并实现本民族重整与再划界的过程。<sup>①</sup>在非洲之角地区,索马里人的跨界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则发展为“泛索马里主义”(Pan-Somalism)。<sup>②</sup>自二战后泛索马里主义产生以来,逐渐发展为非洲之角索马里人中普遍流行的意识形态。它以整合全体索马里人为基本诉求,不仅深刻影响了索马里国家的政治发展轨迹,也极大地冲击了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格局。2012年以来,随着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加大了对周边国家的恐怖袭击力度,它所宣扬的泛索马里主义也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恐怖主义在非洲之角传播的

\*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项目号:16ZDA096)、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非洲的萨拉菲主义:理论与现实”(项目号:15JDFZ02YB)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还获得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资助。

① 刘稚:《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2页。

② 在20世纪90年代,葛公尚就对泛索马里主义问题进行了研究,着重对泛索马里主义的性质与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析。该研究对于澄清泛索马里主义问题的性质意义重大,不过限于篇幅,它缺乏对泛索马里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梳理。另外,随着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的泛滥,泛索马里主义又出现了极端化等此前未曾有过的新情况,也需要学界跟进对此一问题的认识。参见葛公尚:《索马里部族混战透析——兼论泛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对非洲国家发展的影响》,载《世界民族》,1996年第4期,第27—31页。

“载体”。<sup>①</sup> 泛索马里主义究竟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还是一种恐怖主义? 要回答该问题, 不仅需要从民族学、政治学的视角对泛索马里主义的内涵、外延进行现时性的分析, 更需要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对其渊源与流变进行历时性考察, 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其本质特征。

## 一、泛索马里主义的缘起

作为一种对非洲之角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意识形态, 泛索马里主义是多种因素互动的产物。泛索马里主义是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也是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相互碰撞的产物。

第一, 索马里人共同的游牧生活方式、相似的语言与文化信仰是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前提。

首先, 非洲之角的豪德高原(Haud)气候干旱, 生活在该地区的索马里人以牧羊、牧牛为生, 常年逐水草而居, 不断迁徙。在19世纪以前, 索马里人经历了九百年的大迁徙, 基本占据了从塔朱拉湾(Gulf of Tadjura)到贝纳迪尔海岸(Benadir)之间的广阔地区。<sup>②</sup> 游牧区域的一致性, 则使他们需要共同维护草场与水源; 而游牧生活的流动性, 则使索马里人各民族间的交流空前密切。在面对西部的埃塞俄比亚帝国时, 索马里人也需要维护他们共同的牧场, 保护自己的家园, 从而形成了最初的群体性意识。<sup>③</sup> 因而, 游牧生活方式为差异性极大的索马里各民族提供了一条相互认同的经济纽带, 尽管这一纽带在历史上较为松散, 但已构成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经济前提。

其次, 随着7世纪以来伊斯兰教传入索马里, 该地区几乎所有索马里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从13世纪开始, 由索马里人建立的阿朱兰苏丹国(Ajuuraan)和阿达勒苏丹国(Adal)与埃塞俄比亚帝国进行了数百年的战争, 这场战争是非洲之角地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势力之争。在战争中, 伊斯兰教成为一种有效的黏合剂, 将彼此矛盾重重的索马里各民族整合起来, 并使他们团结到伊斯兰教的旗帜下。<sup>④</sup> 正是在穆斯林们庆祝他们战胜埃塞俄比亚基督徒的歌曲中, 首次出现了指代整体的“索马里”这一名称。<sup>⑤</sup> 而伊斯兰教提倡的“乌玛”(ummah)又进一步冲击了索马里各民族间的边界, 致力于打造一个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超越地方利益的伊斯兰大家庭, 成为整合索马里人、促进其相互认同的重要宗教力量。<sup>⑥</sup> 伊斯兰教也成为索马里人识别“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标准。<sup>⑦</sup> 因而可以说, 伊斯兰教是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宗教前提。

再次, 在共同游牧生活与宗教信仰的背景下, 索马里人也逐渐形成统一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在各民族方言的基础上、吸收了阿拉伯语的元素发展而来的, 为索马里人提供了共同的语言交流渠道。从今天的吉布提到肯尼亚塔纳河(Tana River)的加里萨(Garissa), 该区域内的所有索马里人都可以使用一种统一的标准索马里语。<sup>⑧</sup> 在这一区域穿行, 没有非洲其他地区那么严重的语言障碍, 这也为索马里人的民族认同奠定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促使索马里人之间的高度融合; 而索马里

① 这种观点可参见 Mohamed Ibrahim, “Somalia and Global Terrorism: A Growing Connec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28, no.3, 2010, pp.286-287.

② I. M. Lewis, “The Somali Conquest of the Horn of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1, no.2, 1960, p.214.

③ I. M. Lewis, “A Pastoral Democracy: A Study of Pastoralism and Politics among the Northern Somali of the Horn of Af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68, no.6, 1963, p.715.

④ [英]I. M.刘易斯著, 赵俊译:《索马里史》, 东方出版中心, 2012年, 第18页。

⑤ I. M. Lewis, “The Somali Conquest of the Horn of Africa”, p.222.

⑥ Oscar Gakuo Mwangi, “State Collapse, Al-Shabaab, Islamism, and Legitimacy in Somalia”, *Politics, Religion & Ideology*, no.4, 2012, p.517.

⑦ [肯尼亚]B. A. 奥戈特主编, 李安山等译:《非洲通史(第五卷):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的非洲》,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年, 第566页。

⑧ [英]I.M.刘易斯著, 赵俊译:《索马里史》, 第5页。

语的优美与其诗歌艺术的高度发达,又使这一语言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索马里氏族去使用它。<sup>①</sup>在反对西方殖民者的战争中,索马里语诗歌的广泛传播与强烈号召力,也进一步使索马里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sup>②</sup>总之,历史上统一索马里语的形成,是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语言前提。

第二,19世纪末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之角的政治瓜分及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扩张,激起了索马里人的反抗意识,强化了索马里人的族群认同感,这成为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外部因素。

奥罗莫人(Oromo)、盖拉人(Galla)、阿法尔人(Afar)等与索马里人交错杂居,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边界”。索马里氏族间的土地划分,也只是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目的,并没有政治涵义。<sup>③</sup>欧洲人的到来,才将现代意义上的“边界”概念引入非洲之角。1827年英国东非印度公司与亚丁湾南岸的哈巴尔·阿瓦尔氏族(Habar Awal)签订了保护协定,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sup>④</sup>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非洲之角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英国加强了对索马里北部地区的控制。到1886年,英国又相继与伊塞(Ise)、盖达布里西(Gadaburis)、哈巴尔·加尔哈吉斯(Habar Garhajis)以及哈巴尔·托尔·贾洛(Habar Tol Jalo)等索马里氏族订约,将其土地合并为“英属索马里兰保护国”(British Somaliland Protectorate)。<sup>⑤</sup>而法国在1885年就与索马里人伊塞氏族、阿姆巴多氏族(Ambado)缔结了友好条约,从而获得在曼德海峡(Bab-el-Mandeb)沿岸的立足点,并于1888年划定与英属索马里兰的边界。1892年,意大利也与桑给巴尔苏丹国(Sultanate of Zanzibar)签署协议,租借了索马里南部地区的布拉瓦(Brava)、马尔卡(Merca)、摩加迪沙(Mogadishu)与瓦尔谢克(Waesheikh)等港口,实际上占领了整个贝纳迪尔海岸。以此为基地,意大利人将势力从沿海又扩张到了整个朱巴河(Jubba River)流域。1891年,意大利与英国划定了意属索马里(Italian Somalis)与英属东非保护国(East Africa Protectorate)的边界;1894年,又进一步划定意属索马里与英属索马里兰间的边界。<sup>⑥</sup>埃塞俄比亚在1896年击败意大利入侵后,也开始向东、南方向的扩张,并兼并了豪德与欧加登(Ogaden)的索马里人游牧地。至此,索马里各氏族分别与英国、法国、意大利签订了保护条约,并被分割开来;另一部分则处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下。不过此时,索马里人对统一“民族”的意识尚不强烈;也正是这个原因,才使欧洲殖民者能顺利完成对非洲之角的瓜分。

真正激起索马里人“民族意识”的是欧洲人把索马里人的土地作为交易筹码随意分割。1896年埃塞俄比亚战胜意大利,英国此时正忙于与法国、俄国的对抗,故而意大利、英国都选择调整与埃塞俄比亚的东部边界,以安抚后者。<sup>⑦</sup>在索马里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1897年英国与埃塞俄比亚签约,将英属索马里兰南部部分地区的保护权转让给埃塞俄比亚。<sup>⑧</sup>意大利也承认埃塞俄比亚占领欧加登大部分地区。直到1908年以前,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多次调整欧加登地区的边界,随意处置索马里人的土地。1925年,英国又将东非保护国境内索马里人居住的朱巴兰和基斯马尤

① Ali A. Mazrui, *The Africans: A Triple Heritage*,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86, pp.70-71.

②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Muhammad Abdul Hassan)作为索马里反殖民主义战争的领袖,就是通过撰写大量索马里语诗歌,来唤起民众的。Ali A. Mazrui, *The Africans: A Triple Heritage*, p.71.

③ Marco Zoppi, “Greater Somalia, the Never-ending Dream? Contested Somali Borders: the Power of Tradition vs. the Tradition of Power”,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Politics & Society*, vol.1, no.1, 2015, p.47.

④ Abdi Sheik-Abdi, “Somali Nationalism: Its Origins and Future”,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15, no.4, 1977, p.657.

⑤ A. Abukar, *Somalia: A Brief Country Report*, Amsterdam: AWEPA, 2015, p.9.

⑥ I. M. Lewis, *The Modern History of Somaliland: From Nation to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5, pp.51-53.

⑦ Daniel D. Kendie, “Toward Northeast African Cooperation: Resolving the Ethiopia-Somalia Disputes”, *Northeast African Studies*, vol.10, no.2, 2003, p.71.

⑧ 葛公尚主编:《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Kismayu)作为一战的战利品“赠送”给意大利。<sup>①</sup> 这一系列的领土交换,都未考虑索马里人的放牧与饮水需求,并阻断了传统的商道。当边界在反复修正的过程中变为具有实际意义的事物时,索马里人才意识到自身被分割、殖民的现实,并恼怒于成为他国交易的筹码。直至此时,“索马里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即最初的泛索马里主义才开始流行起来。<sup>②</sup> 可以说,外部瓜分所导致的索马里人居住地域与政治边界间的“错位”是泛索马里主义产生的外源。

第三,索马里人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强化了各民族间的相互认同与归属,成为泛索马里主义形成的内部因素。

殖民者对非洲之角的瓜分瓦解了索马里人的传统纽带,点燃了索马里人的民族意识,激起索马里人的一系列反抗斗争。这些斗争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武装斗争为主,其代表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哈桑领导的反抗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二十多年,沉重打击了西方与埃塞俄比亚的入侵者。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武装反抗并不局限在某个殖民地的边界内,而波及到了索马里人各个氏族;反抗的对象也不局限于某个殖民国家,而是针对英国、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等所有的“入侵者”。在冲突中,反抗力量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方式,战场则遍布整个索马里人居住区,各个氏族不分差别地都参与了进来。尽管反抗斗争最终失败了,却使各民族间的联系空前加强,并锻造出强韧的统一索马里的观念。<sup>③</sup> 第二阶段以政党斗争为主。随着殖民统治的深化,传统朴素的索马里民族意识发展为一种现代民族主义,以“民族自决权”为前提,更加明确地提出领土与族群统一的诉求。无论是在英属索马里兰还是意属索马里,当地索马里人都自发组织起政治俱乐部或协会,他们从争取个人权利入手,进而提出更高的自治、乃至独立的政治目标。<sup>④</sup> 1943年成立的“索马里青年俱乐部”(Somali Youth Club)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虽然其活动中心在摩加迪沙,但成员来自索马里各个氏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活动并不局限于意属索马里,在埃塞俄比亚的豪德、欧加登地区、英属索马里兰境内,都有其分支机构。该俱乐部最初致力于促进殖民地内索马里人的福利,随着形势的发展,它开始积极宣扬超越氏族边界的政治意义,鼓吹“索马里人一体”的思想。<sup>⑤</sup> 到1946年,其成员已超过2.5万人,影响力遍及索马里人的精英阶层。<sup>⑥</sup> 此外,英属索马里兰境内的索马里民族协会(Somali National Society)、索马里公务员联盟(Somali Officials Union)等组织也都鼓吹民族整合的理念。它们的活动推进了民众对“统一索马里”的认同,“泛索马里主义”的思想雏形初步形成。

第四,二战后英国对索马里人的政治整合计划及其失败,最终促成了泛索马里主义的产生。

二战期间非洲之角的战争摧毁了意大利的殖民统治,英国在战后接管了包括欧加登、意属索马里在内的广大地区。<sup>⑦</sup> 在意识到索马里人内在的统一诉求后,英国政府试图把英属索马里兰、意属索马里与欧加登等地整合在一起。一方面,英国试图在三个地区之上建立一个最高权威,通过发行统一货币、制订统一关税,以促进内部的经济交流。<sup>⑧</sup> 另一方面,英国当局主动与索马里人的政治

① Mahasin A. G. H. Al-safi, “Kenya Somalis: The Shift From ‘Greater Somalia’ to Integration with Kenya”, *Nordic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4, no.2, 1995, p.35.

② 肖玉华、刘鸿武:《非洲之角安全困局述评》,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第35页。

③ Abdi Sheik-Abdi, “Somali Nationalism: Its Origins and Future”, p.659.

④ I. M. Lewis, “Pan-Africanism and Pan-Somalism”,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1, no.2, 1963, p.148.

⑤ Alice A. Adalian, “The Horn of Africa”, *World Affairs*, vol.131, no.1, 1968, p.39.

⑥ [英]I.M.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114页。

⑦⑧ Ahmed H Nur, “Does Somaliland Have a Legal Ground for Seek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Somaliland Law*, April 2011, p.1.

团体合作,鼓励通过温和改良的方式达成索马里的最终独立与统一。<sup>①</sup> 这些措施得到了索马里人的欢迎与积极响应,进一步推动了“统一索马里”意识的形成;然而,它也不恰当地激起了一股全盘否认现有边界、欲将全体索马里人都整合到一个“大索马里国家”中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sup>②</sup>

1946年,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以索马里人的共同意愿为基础,提出了整合索马里人、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的“贝文计划”(Bevin Plan)。该计划试图将意属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都纳入英属索马里兰,再由英国引导其走向独立。<sup>③</sup> “贝文计划”提出后,尽管索马里人的支持情绪空前高涨,但埃塞俄比亚政府却坚决反对。英国试图将厄立特里亚交予埃塞俄比亚以安抚后者,并提出愿意把泽拉港(Zeila)及英属索马里兰西北的一块地方让予埃塞俄比亚。<sup>④</sup> 这一领土交换设想遭到美苏的共同反对,两国都担心英国在非洲之角的势力会因此扩张。英国无力与美苏抗衡,只得放弃“贝文计划”;同时为了履行战时英国-埃塞协议(1942年、1944年),承认欧加登地区为埃塞俄比亚领土。<sup>⑤</sup> 1948年,埃塞俄比亚政府正式确认了东南部的边界,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氏族都划归其中。<sup>⑥</sup> 情势急转直下,大索马里国家的愿景旋起旋灭,索马里人看到自己再次被外国“瓜分”。在愤怒与失望之余,他们决定自主寻求一条独立建国之路。在1948年,由“索马里青年俱乐部”改组而成的索马里青年联盟(Somali Youth League)向调查索马里问题的美、英、苏、法四大国委员会(Four Power Commission)正式提出了“泛索马里主义”的设想,并论证其合理性。<sup>⑦</sup> 至此,作为一种超越氏族、反对分割、打造统一国家的泛索马里主义正式产生了。

## 二、西方政治理念影响下的泛索马里主义

泛索马里主义既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也是殖民遗留问题,其演变难以脱离西方政治观念的影响。从1948年至1978年,泛索马里主义试图从西方政治话语中找到最合适的表述,以寻求思想及其行动的合法性支持。

第一阶段,从1948—1960年,泛索马里主义主要以反欧洲殖民主义为旗号,以政党政治为手段,其诉求是初步建立一个局部统一的索马里人独立国家。

1948年“贝文计划”流产后,索马里人被分割的状况愈演愈烈。一方面,英国放弃其整合英属索马里兰与意属索马里的努力,将意属索马里转交给意大利“托管十年”;另一方面,英国于1954年同埃塞俄比亚签订《英-埃塞协议》(*Anglo-Ethiopian Agreement*),将英属索马里兰三分之一的土地划归埃塞俄比亚。<sup>⑧</sup>

在索马里人看来,英国殖民主义者操纵了这一系列阴谋。因而,泛索马里主义在其最初阶段就是以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为旗号的。索马里政治家认为,只有团结全体索马里人,摆脱英、意的统治,取得独立,才能免受进一步瓜分之苦。反之,由于该地区反殖民主义本身诉求的内容空洞与形式贫

① Cedric Barnes, “The Somali Youth League, Ethiopian Somalis and the Greater Somalia Idea, c.1946-48”,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1, no.2, 2007, p.281.

② Ahmed H Nur, “Does Somaliland Have a Legal Ground for Seek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p.1.

③ 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编著:《列国志·索马里、吉布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④ Saul Kell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Italian Empire in Africa, 1940-52”,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vol.28, no.3, 2000, p.59.

⑤ Cedric Barnes, “The Somali Youth League, Ethiopian Somalis and the Greater Somalia Idea, c.1946-48”, p.281.

⑥ [美]萨义德·A.阿德朱莫比著,董小川译:《埃塞俄比亚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6页。

⑦ I. M. Lewis, “Pan-Africanism and Pan-Somalism”, p.149.

⑧ Ahmed H Nur, “Does Somaliland Have a Legal Ground for Seek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p.2.

乏,<sup>①</sup>也导致其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填充物”,来赋予反殖民主义以实质性内涵。在索马里人中,泛索马里主义正为其提供了“战斗的火药”,使反殖民主义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20世纪50年代,泛索马里主义与反殖民主义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得到几乎所有索马里人的认可。殖民地内的政治团体如索马里兰民族联盟(Somaliland National League)、索马里青年联盟、独立立宪党(Hizbia Dastur Mustaqil Somali)、索马里统一党(United Somali Party)都将其接纳为自身的政纲。<sup>②</sup>这使政党对外获得了反殖民主义的正义性,对内也赢得了广大索马里民众的支持。它们在活动中,经常同时提及这两个概念,进一步使其合二而一。

在各政党的活动下,1956年,英属索马里兰与意属索马里都分别建立了代议制政府,为下一步实现独立奠定了基础。在殖民末期索马里各政党的选举中,泛索马里主义已成为各派政治动员的重要精神资源。例如,1958年意属索马里的选举中,索马里青年联盟和独立立宪党正是打着泛索马里主义的旗号赢得选举;<sup>③</sup>1960年英属索马里兰的选举中,索马里兰民族联盟和索马里统一党也都因宣扬泛索马里主义,两党几乎包揽了全面议席。<sup>④</sup>此外,法属索马里兰(French Somaliland)与欧加登的政治组织也都受到泛索马里主义的鼓动。

由于基本目标的一致性,各政党沟通彼此观点、协调行动。1959年,各属地的党派齐聚摩加迪沙,组织起“泛索马里民族运动”(National Pan-Somali Movement),提出了建立统一索马里民族国家的方案。<sup>⑤</sup>该方案的第一步就是在反殖民主义胜利后,将英属索马里兰与意属索马里先行统一起来。在“泛索马里民族运动”的推动下,意属索马里与英属索马里兰各政党间经过多轮讨论,决定于1960年两地分别独立后合并为一个索马里共和国。<sup>⑥</sup>

第二阶段,从1960—1969年,泛索马里主义以反“邻国殖民主义”为旗号,以政府为主要实施者,试图同时达成内部整合与外部扩张的双重目标,在现有国家的基础上扩充为一个统一的大索马里。

1960年7月,初步统一的索马里共和国成立后,不仅面临着巩固新生国家的任务,而且需要妥善应对国内涌动的“收复”其他索马里土地、反击所谓“邻国殖民主义”的政治热情。<sup>⑦</sup>因而,这一时期的泛索马里主义分化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实施路径:一部分人主张先进行内部整合,稳扎稳打地推进“统一”进程;另一些人则主张再接再厉,将欧加登、肯尼亚东北部等地全部“统一”,之后再谈国家整合问题。<sup>⑧</sup>以此为标志,泛索马里主义就被不同主张的人群分别进行阐释与利用,成为一个内涵极度混乱的概念。

索马里政府试图平衡两种倾向。一方面它采取措施推进国内整合进程:(1)以前英属索马里兰的财政与会计制度为范本,统一全国税率及关税制度;(2)打破南北公务员的界限,实行跨区域无差别办公,并统一公务员的工资标准;(3)统一南北方法律,如将南方普选权原则扩大到北方。<sup>⑨</sup>不过,由于两个殖民地仓促合并,也遗留了一些问题。索马里南北方的官方语言分别是意大利语和英语,存在沟通障碍;两地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很滞后,导致联系不便;最关键的问题是两套殖

①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91页。

②③ Peter J. Schraeder, *From Irredentism to Secession: The Decline of Pan-Somali Nation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p.114.

④⑤ [英]I.M.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142、143页。

⑥ Peter J. Schraeder, *From Irredentism to Secession: The Decline of Pan-Somali Nationalism*, p.116.

⑦ 所谓“邻国殖民主义”是对两国间领土纠纷的一种意识形态化阐释,其根源在于盲目自我膨胀与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

⑧ I. M. Lewis, “The Somali Republic since Independence”, *The World Today*, vol.19, no.4, 1963, p.170.

⑨ [英]I.M.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160页。

民体系间的制度对接不畅。<sup>①</sup>这些都导致了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南北分歧在短时间内难以弥合。合并之初,南北间的矛盾就已经凸显,北方索马里兰的分离思潮流行起来,并引发了1961年的军事政变。<sup>②</sup>新生索马里国家内部的裂痕自始至终都没有消除。

另一方面,政府则鼓励并推动大索马里国家的建立。在政策宣示上,共和国独立宪法第6条第4款就规定,“索马里共和国将以合法的、和平的手段促进索马里所有领地的统一,支持世界各民族的团结,尤其是非洲和伊斯兰世界民族的团结。”<sup>③</sup>从宪法层面否认了现有边界的合法性。索马里国旗也极富扩张意味:旗帜上的五颗白星指代索马里人居住的五个地区,而其中三个地区还处于邻国“占领”之下。<sup>④</sup>在各种外交场合,索马里政府都鼓吹“统一五个索马里人地区”的思想,并引发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关系的紧张。<sup>⑤</sup>在具体行动中,1963年,索马里政府支持欧加登索马里人建立反政府武装“西索马里解放阵线”(Western Somali Liberation Front),试图脱离埃塞俄比亚的管辖;1964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间甚至爆发了边界战争。<sup>⑥</sup>同时,索马里也支持肯尼亚东北省的索马里人反政府武装,引发了直至1967年才结束的希夫塔战争(Shifta War)。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也因此结成了反索马里的“准联盟”,共同遏制索马里的扩张。<sup>⑦</sup>甚至吉布提的索马里人在1967年全民公投中也更愿意留在法国,拒绝归并到索马里共和国中,殖民地的名字也从“法属索马里海岸”(French Coast of Somalis)改为“法属阿法尔与伊萨领地”(French Territory of the Afars and the Issas),以示与索马里划清界限。<sup>⑧</sup>总之,索马里政府的这种外部政策不仅引发了邻国的警惕与敌意,也未能成功达到“收复失地”的目标,反而令自身陷入孤立境地。<sup>⑨</sup>

这两种主张虽然最终目标都指向一个统一的大索马里国家,但具体实现路径截然不同,其内在张力令索马里新生政府左支右绌,新生国家有限的资源也无力同时支撑两种计划的顺利实施,这就导致对内整合受挫,对外扩张不利。这种“双轮驱动”的方式显然不能达成泛索马里主义的目标,反而诱使索马里政党政治的破产。

第三阶段,从1969—1978年,泛索马里主义被嫁接到“科学社会主义”之中,巴雷军政府试图以此援引苏联的力量来建立大索马里国家,反而被卷入全球意识形态对抗的冲突中。

20世纪60年代末,内外交困的索马里政府试图通过对内组建一党独大的政府以消除南北分歧;对外缓和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关系以改善恶化了的外部环境。这被国内民众解读为专制与叛卖,并引发了军队干涉。1969年底,以西亚德·巴雷(Muhammad Siyad Barre)为首的最高革命委员会(Supreme Revolutionary Council)推翻民选政府,建立了军人政权。

在巴雷军政府时期,“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其推进泛索马里主义的口号,并试图为泛索马里主义注入革命动力。巴雷抛弃民选政府时期内外兼顾的政策,全力对外扩张,以实现统一的大索马里国家为核心目标,这一时期索马里内政都是服务于其外部扩张战略的。军政府首先试图通过鼓舞民众的“革命热情”来消除内部分歧,抑制地方氏族主义,<sup>⑩</sup>随后便将这种“革命热情”引导至“解放”境外索马里人的目标上去;并将“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置于反对民族压迫与帝国主义欺凌的“社

① Ahmed H Nur, “Does Somaliland Have a Legal Ground for Seeking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p.4.

② A. Abukar, *Somalia: A Brief Country Report*, p.20.

③ I. M. Lewis, “Pan-Africanism and Pan-Somalism”, p.151.

④⑤ OSC, *The Country Report: Somalia*, Reston: Open Source Center, May 2012, p.13, 14.

⑥ Daniel D. Kendie, “Toward Northeast African Cooperation: Resolving the Ethiopia-Somalia Disputes”, p.76.

⑦ [美]罗伯特·马克森著,王涛、暴明莹译:《东非简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259页。

⑧ Mohamed Kadamy, “Djibouti: Between War and Peace”,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23, no.70, 1996, p.512.

⑨ Daniel D. Kendie, “Toward Northeast African Cooperation: Resolving the Ethiopia-Somalia Disputes”, p.77.

⑩ [英]I.M.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192页。

会主义革命”语境之中大肆宣传。为了扩大宣传的影响力,1972年军政府还以拉丁字母重新书写索马里语,并作为官方文字广泛推广,培养统一的国家认同,其中特别针对境外的索马里人。<sup>①</sup>

“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推进泛索马里主义的重要手段。军政府以此来索取苏联、古巴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军政府上台一年后,就对外宣称推行“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路线,其本质意图在于引入强有力的外援,重塑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格局。<sup>②</sup> 1974年,索马里与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友好条约,获得了来自苏联的军事援助。<sup>③</sup> 它还加强了与古巴和东欧国家的合作。<sup>④</sup>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邻国则倒向美国,以制衡索马里。美苏冷战使非洲之角成为两极对抗的战场,索马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都被纳入到了全球冷战体系中。反过来,索马里也借助冷战的国际大形势,试图加速践行泛索马里主义的理念。<sup>⑤</sup> 可以说,巴雷军政府巧妙地利用美苏对抗,将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的目标嫁接到共产主义革命的使命中去,并赋予泛索马里主义以新时期的内部合法性与外部正义性。<sup>⑥</sup>

1977—1978年的欧加登战争(Ogaden War)成为泛索马里主义借助“科学社会主义”实现自身目标进入高潮的标志事件。1974年埃塞俄比亚政治危机与欧加登地区石油资源的潜在前景,诱使巴雷军政府发动战争“收复失地”,然而随着埃塞俄比亚“德格”政权(Derg)的新建并快速转向社会主义,索马里的盟友苏联、古巴都选择拉拢地区影响力更为强大的埃塞俄比亚,并派援军支援埃塞军队,这直接导致索马里的战败。<sup>⑦</sup>

于是,欧加登战争也成为泛索马里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转折点。一方面,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对索马里的背弃使其失去了“革命”的外部合法性依恃,<sup>⑧</sup>进而瓦解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泛索马里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建构。另一方面,由于早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使索马里在这场战争中无法赢得欧美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欧美各国普遍使用“夺取”“占领”等负面词汇来定位索马里的行动,“科学社会主义”甚至成为实现泛索马里主义的一个负资产。<sup>⑨</sup>

### 三、本土氏族与宗教思潮影响下的泛索马里主义

脱胎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泛索马里主义,因一味追求与外部世界的话语协调,因而脱离了索马里及非洲之角的实际情况,这也正是泛索马里主义与外部观念冲突的根源。1978年以来,泛索马里主义开始从本土氏族、宗教文化传统中寻求突破与发展。

第一阶段,1978—1991年,泛索马里主义回归到氏族主义层面,重新建构自身的理念与实践基础,并以巴雷军政府为斗争对象,试图通过推翻其统治来推进泛索马里主义。

巴雷军政府在欧加登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其加紧了对内控制,泛索马里主义逐渐被政权“冷藏”起来。为了维持统治,政府不再空谈统一的“索马里民族”,转而依赖巴雷所在氏族——马雷汉

①⑤ A. Abukar, *Somalia: A Brief Country Report*, p.22, 664.

② Abdi Sheik-Abdi, “Somali Nationalism: Its Origins and Future”, p.664.

③ Gary D. Payton, “The Somali Coup of 1969: The Case for Soviet Complicity”,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18, no.3, 1980, p.494.

④ Ahmed I. Samatar, “Self-Reliance Betrayed: Somali Foreign Policy, 1969–1980”,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21, no.2, 1987, pp.211–212.

⑥ [肯尼亚]A.A.马兹鲁伊主编,屠尔康等译:《非洲通史(第八卷):1935年以后的非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588页。

⑦ [挪]文安立著,牛可等译:《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282页。

⑧ Bruce D. Porter, *The USSR in Third World Conflict: Soviet Arms and Diplomacy in Local Wars, 1945–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00.

⑨ [英]I.M.刘易斯著,赵俊译:《索马里史》,第223页。



氏族(Marehan clan)的支持,其统治策略也越来越趋于对国内索马里各氏族的“分而治之”。<sup>①</sup>这种“氏族主义”看不到作为整体的“索马里人”,而只关注与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社群利益,它的发展严重破坏了索马里人的团结。另外,为了稳固政权,巴雷主动寻求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缓和,特别是在1988年与门格斯图(Mengistu)签署的协议,标志着巴雷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中均已放弃了泛索马里主义。<sup>②</sup>因而可以说,自欧加登战争结束以来,巴雷军政府不仅不再是泛索马里主义的代言人,反而走向其对立面。<sup>③</sup>

以此为标志,泛索马里主义中的氏族差异被放大,统一的理念被削弱。此后一个时期,一些索马里氏族领袖立足于本氏族层面,从最底层夯实泛索马里主义的基础。泛索马里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产物,从1948—1978年,它三十年的发展也基本上依托于西方的组织或制度形式。这种从思想到实践的“舶来型特征”是导致其根基不稳,无法切实推进的根源。索马里的现实是,氏族传统根深蒂固,民族国家尚未确立。面对这种国情,如何将泛索马里主义与索马里各氏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探索理念的有效形式,成为1978年以来索马里人思考的问题。对泛索马里主义而言,这也是其“本土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开端,即将泛索马里主义与氏族现实充分结合。

在实践上,这一时期的泛索马里主义的主要敌人是“背叛理想”的巴雷军政府,在推翻该政府的行动中,各氏族间加强了联系与整合。1978年战争甫告失败,出身于米朱提因氏族(Majertheyn clan)的军人就发动了推翻巴雷的政变。<sup>④</sup>尽管这次政变以失败而告终,但此后氏族武装纷纷兴起。1979年,在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Abdullahi Yusuf Ahamad)组织下,索马里救国阵线(Somali Salvation Front)成立,成为第一个对抗巴雷军政府的氏族武装。<sup>⑤</sup>此后,索马里民族运动(Somali National Movement)等反政府武装相继建立。为了尽早推翻巴雷军政府,各氏族武装进一步联合;并于1981年合并形成了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Somali Salvation Democratic Front)。<sup>⑥</sup>1990年,氏族武装进一步结成统一战线,并于1991年推翻巴雷军政府。<sup>⑦</sup>

尽管这一时期泛索马里主义推翻巴雷政权的理想得以实现,但以氏族为起点的理念与实践整合却在发展过程中“变质”了。氏族武装联盟在消灭了共同的敌人后,彻底分崩离析,索马里也进入了割据与内战时期。究其原因,氏族的保守性、孤立性、分散性不足以“升华”到泛索马里主义;不仅如此,氏族主义与泛索马里主义在理念目标上都是根本对立的:前者以本氏族利益为旨归;后者则要超越这种狭隘的利益。

第二阶段,1991—2012年,泛索马里主义借助伊斯兰主义的力量,试图以共同的宗教调和各氏族间的差异,通过常规武装斗争消除索马里人的内在分裂。

巴雷军政府被推翻后,氏族武装间的冲突使索马里国家陷入分裂。1991年,前英属索马里兰地区宣布“独立”,从索马里国家中分离出去。而前意属索马里地区则陷入了武装割据与纷争的局面之中,沦为各氏族争权夺利的角斗场。<sup>⑧</sup>事实证明,以氏族为基础的泛索马里主义不仅不能推动索马里人

① John L. Hirsch and Robert B. Oakley, *Somalia and Operation Restore Hope: Reflections on Peacemaking and Peacekeeping*,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5, p.9.

② Marco Zoppi, “Greater Somalia, the Never-ending Dream? Contested Somali Borders: the Power of Tradition vs. the Tradition of Power”, p.56.

③ Samuel M. Makinda, *Seeking Peace from Chaos: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Somalia*,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3, p.21.

④ Marco Zoppi, “Greater Somalia, the Never-ending Dream? Contested Somali Borders: the Power of Tradition vs. the Tradition of Power”, p.56.

⑤⑥ Harry Ododa, “Somali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the Ogaden War of 1977-78”,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21, no.3, 1985, p.286.

⑦ Mark Bradbury, *Becoming Somaliland*, Cumbria: Long House Publishing Service, 2008, p.46.

⑧ 樊小红:《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初探》,载《西亚非洲》,2010年第10期,第38页。

的团结,反而因强化了各自的差异性而诱发更激烈的内部冲突,民众也陷入长期的内战无法解脱。

在西方理念与氏族主义都失灵的情况下,伊斯兰主义作为索马里人长期以来信奉的宗教准则,逐渐在政治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巴雷时期,政府曾大力压制伊斯兰主义思潮,政府发展导向是世俗性的。随着中央政府的瓦解,伊斯兰主义失去了制衡的力量,开始日益活跃。<sup>①</sup>内战的长期性与残酷性,更使得大量民众寻求宗教的慰藉,不少人则试图从伊斯兰教中寻求拯救国家的出路。

所谓伊斯兰主义,突出表现为伊斯兰的政治化与政治的伊斯兰化,它一方面是政府自上而下地颁行伊斯兰教法、实现社会伊斯兰化、反对西方化和世俗化;另一方面则是宗教政治反对派要求政府恢复和实施伊斯兰化,并以合法或非法、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向政府发难。<sup>②</sup>伊斯兰主义解构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并将“真主主权”作为新的政教合一国家的存在前提,<sup>③</sup>这正为泛索马里主义打破非洲之角现有国界提供了理论根据。因而,伊斯兰主义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对立物,而成为索马里跨界民族主义的新载体。<sup>④</sup>在这一时期,索马里的伊斯兰主义者试图通过宗教为泛索马里主义赋予新的活力——既是本土民众的共同信仰,也是消除目前各种弊端的“良方”。事实上,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非洲之角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也随之下降,特别是在1993年美国干预索马里内战失败后,索马里迅速成为一个被全世界“遗忘的地方”。<sup>⑤</sup>除了伊斯兰主义这一思想资源外,泛索马里主义也没有其他资源可资利用。因而,这一时期泛索马里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紧密结合起来,试图利用伊斯兰教在全体索马里人中的影响,填补此前世俗性泛索马里主义留下的思想真空,重新整合分崩离析的国家。

内战期间,一批宗教武装涌现出来。它们要么以氏族武装为“母体”,实现对氏族武装的“跨氏族改造”,要么独立于氏族武装之外,另建新的组织。随着氏族武装局限性的暴露无遗,伊斯兰慈善团体、宗教法院与武装组织开始取而代之,成为索马里各氏族民众依靠的对象。<sup>⑥</sup>在伊斯兰教旗帜下,索马里人中间兴起一股新的、宗教性的整合力,为泛索马里主义的发展注入新动力。其中,1992年建立的西索马里伊斯兰联盟(al-Itihaad al-Islamiya)试图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统一索马里国家,进而兼并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地区。<sup>⑦</sup>以1994年的北摩加迪沙法院与1996年的贝莱德文(Beled Weyne)法院为基础,1999年组建了超越氏族界限、以宗教为号召、以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国”为最终目标的“伊斯兰法院联盟”(The Islamic Courts Union)。<sup>⑧</sup>以其组建为标志,泛索马里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正式结合起来了。

法院联盟建立后,通过常规战争击败各地氏族武装。2006年6月它完全控制了摩加迪沙,随后将势力扩张到乔哈尔(Jowhar)、基斯马尤(Kismayo)、贝莱德文(Beledweyne)和奥比亚(Obbia)等地。<sup>⑨</sup>当年年底,法院联盟就已控制了邦特兰(Puntland)以南几乎全部索马里的土地。<sup>⑩</sup>法院联盟的攻势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2006年埃塞俄比亚最终出兵干预,击溃了法院联盟。<sup>⑪</sup>作为其后继者

① Hussein Ahmed, “Reflections o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Islam in Ethiopia and Somalia: A Comparative and Contrastive Overview”,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vol.40, no.1/2, 2007, p.270.

② 刘中民:《关于伊斯兰复兴运动概念、术语和类型研究的若干讨论》,载《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70—72页。

③ 刘中民:《中东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5期,第40—41页。

④ 李福泉:《索马里政治伊斯兰的演进与特点》,载《国际论坛》,2012年第6期,第74页。

⑤ A. Abukar, *Somalia: A Brief Country Report*, p.26.

⑥ 涂龙德、周华:《伊斯兰激进组织》,时事出版社,2010年,第378页。

⑦ Alex de Waal, *Islamism and Its Enemies in the Horn of Africa*,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4, p.125.

⑧ Lara Santoro, “Islamic Clerics Combat Lawlessness in Somalia”,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ly 13, 1999.

⑨ Angel Rabasa, *Radical Islam in East Africa*,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p.62.

⑩ Katerina Rudincová, *Islamic Movements in Somalia: Global or Local Jihad?* Ostrava: University of Ostrava, 2011, p.274.

⑪ Edmund Sanders and Abukar Albadri, “Somalian Troops Take Their Capital”,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29, 2006.

的青年党(Al-Shabaab)也曾一度以复制常规战争的方式整合索马里全国。它从2008年8月夺取基斯马尤开始,到2009年1月就基本重新控制了邦特兰以南的全部索马里土地,并攻占索马里过渡政府(Transitional National Government)所在地拜多阿(Baidoa)。然而,埃塞俄比亚与肯尼亚的新一轮外部干涉再次压缩了青年党的势力范围。<sup>①</sup>

以2012年9月青年党最后一个据点和财源地基斯马尤的失陷为标志,通过泛索马里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结合、以常规战争整合国家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宗教与政治的结合所带来的冲击引发邻国的警惕与干涉,而在常规战斗中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泛索马里主义的失败。

第三阶段,2012年以来,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相关联,试图以非常规恐怖袭击为手段达成所谓“大索马里伊斯兰国”的目标。

法院联盟与青年党常规战争的相继失败,表明了力量对比失衡的前提下,只能选择非常规手段实现既定目标,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力、影响力也只能通过恐怖袭击表现出来。尽管此后一个时期,泛索马里主义仍与伊斯兰主义结合,但随着手段的变化,伊斯兰主义也发生了“变质”。当恐怖袭击成为泛索马里主义实现目标最主要的手段时,伊斯兰主义的外壳中包裹着的就是极端主义的内核了。<sup>②</sup>

青年党首领戈达内(Ahmed Abdi Godane)早在2009年就宣誓向“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Bin Laden)效忠,2012年2月,“基地”组织则正式认可了青年党的加入,后者成为“基地”组织在非洲之角的最大分支。<sup>③</sup>青年党逐步加强了对“圣战”的宣扬力度,试图将泛索马里主义的目标整合进“全球圣战”的宏大叙事体系中。<sup>④</sup>在人员构成上,外籍成员也逐渐成为青年党的重要构成,除了一部分外籍索马里裔以外,其他成员主要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也门、苏丹、沙特阿拉伯甚至美国。这些人怀抱“全球圣战”的理想加入青年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泛索马里主义的影响。<sup>⑤</sup>在行动方式上,此前青年党以传统战争手段为主,外籍战士的加入将多种恐怖袭击形式,如远程爆炸、自杀袭击、暗杀等都带进青年党,并成为此后青年党的主要行动方式。<sup>⑥</sup>在战斗范围上,扩展到了周边国家,尤其是加强了对肯尼亚的袭击。其中最恶劣的事件有:2013年9月,袭击内罗毕西门购物中心(Westgate Mall),导致60多人丧生;<sup>⑦</sup>2014年底,青年党在肯尼亚东北部曼德拉郡(Mandera)先后对公交车和采石场发动袭击,60余人丧生;2015年4月,袭击肯尼亚加里萨大学学院(Garissa University College),140多人丧生。<sup>⑧</sup>在行动目标上,青年党的短期目标是将索马里境内的外国军队全部驱逐,并“净化”国内受非伊斯兰思想影响的“世俗化地区”;中期目标是暴力推翻索马里过渡政府,并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政权;长期目标是团结全世界穆斯林,构建一个统一的全球性伊斯兰哈里发政权。<sup>⑨</sup>泛索马里主义成为“全球圣战”的一个阶段,它在向“全球圣战”借势的同时,自身也被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所整合、消解了。2015年以来,随着“伊斯兰国”在非洲之角建立

①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80—83页。

② 宁彧、王涛:《索马里青年党的意识形态与身份塑造》,载《世界民族》,2017年第3期。

③ 蒋安全:《索马里“青年党”宣布加入“基地”组织》,载《人民日报》,2012年2月12日,第3版。

④ 王涛、宁彧:《萨拉菲主义的多维透视——兼论萨拉菲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1期。

⑤ Hussein Solomon, “Somalia’s Al Shabaab: Clans vs Islamist Nationalism”,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1, no.3, 2014, p.360.

⑥ Daniel E. Agbibo, “Al-Shabab, the Global Jihad, and Terrorism without Borders”, *Aljazeera*, September 24, 2013.

⑦ Daniel E. Agbibo, “Terrorism without Borders: Somalia’s Al-Shabaab and the Global Jihad Network”, *Journal of Terrorism*, vol.5, iss. 1, 2014, p.27.

⑧ 丁小溪:《肯尼亚遭遇恐怖主义之痛》,载《参考消息》,2015年4月6日,第11版。

⑨ 王涛、秦名连:《索马里青年党的发展及影响》,第79页。

了索马里省分支,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合流、并逐渐被后者影响、操控的趋势更加明显。<sup>①</sup>

未来,泛索马里主义将走向何方?2012年9月索马里联邦政府成立后,其生存要依赖国际社会的支持,它也必须遵守国际法的相关准则,而对现有国家边界的认可是重要一环。加之联邦政府对索马里全境的管控力持续低下,因而它恐怕不可能在短期内举起泛索马里主义的旗帜。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意识形态,泛索马里主义在未来只能继续依附于恐怖主义组织青年党,并被后者所“异化”。从前景上看,泛索马里主义几无实现的可能,而长期的冲突、恐怖袭击则会令民众更关注安稳的生活,泛索马里主义的未来影响也有可能被削弱。

#### 四、结 论

通过对泛索马里主义渊源、流变的阐述,笔者初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

第一,从历史的视角看,泛索马里主义是一个内涵相对固定,而外延不断演变的跨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无论什么时期,泛索马里主义都追求建立统一的大索马里国家。但不同时期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手段、方式都是极为不同的,既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宗教性的。斗争对象也千差万别,从西方殖民主义者,到周边邻国,再到“圣战者”眼中的世俗政权,并无一确定的对象。

第二,泛索马里主义这种非同质化特征,决定了它不能简单等同于民族主义。一般而言,民族主义的主要功能在于加强对本民族起源与生活场域的历史认同,表达民族的集体身份并以此为基础证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维系本民族价值体系的文化符号系统。<sup>②</sup>在完成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任务后,它的主要意义就集中在建设方面。而在不同地域索马里人的生活轨迹已发生显著分化的情况下,泛索马里主义完全不顾历史进程的不可逆性,拒绝对其他族群历史、现实权利的认可与接纳,试图以完全排他性的手段,彰显本民族“至高无上的利益”,从而导致对民族国家范式的误读,以及对民族自决权的滥用。<sup>③</sup>因而,泛索马里主义产生的主要影响是破坏性的。笔者认为,泛索马里主义既带有民族主义的表征,但本质上却是反民族主义的文化沙文主义(以某种“文化符号”为依据,<sup>④</sup>扩大化地构建本族群的历史,从而演变为对一种文化观念的认同)。

第三,正是这种文化沙文主义的特征,使得泛索马里主义在当代与恐怖主义产生了某种联系。二者的这种联系是确实的,从恐怖主义组织青年党致力于建立“大索马里伊斯兰国”的目标中就能看出来。对于这种联系,尽管周边一些国家持“等同说”的论调,但通过本文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仅是一种相互借势、各取所需的关系,而不是谁包含谁、谁属于谁、谁等同谁的问题。随着全球恐怖主义的泛滥,泛索马里主义已有被恐怖主义日益裹挟、不断“异化”的趋势,但不应将泛索马里主义与恐怖主义等同起来。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前者的诉求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素。索马里周边国家境内确实分布着大量索马里人,他们与索马里国家有着语言、习俗乃至文化、信仰上的联系。只要承认这些邻国索马里人的身份,泛索马里主义就不仅是“想象的共同体”。

第四,在承认泛索马里主义历史的合理性因素的同时,更要看到,这种合理性只是文化合理性,

① 前青年党骨干阿卜杜勒·穆明(Abdulqadir Mumin)于2015年转而效忠“伊斯兰国”。另一个前青年党成员穆罕默德·阿卜迪·阿里(Mohamed Abdi Ali)又组织领导了“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Somalia, Kenya, Tanzania, and Uganda,也被称为“东非贾巴”Jahba East Africa),也于2016年9月向“伊斯兰国”宣誓效忠。参见刘中民、赵跃晨:《“伊斯兰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载《国际展望》,2018年第2期。

② E. Hobsbawn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③ 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7页。

④ 在非洲之角地区,“索马里语”就成为一种认同的文化符号。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索马里人都讲索马里语,而讲索马里语的人也不一定是索马里人。

而非政治合理性。从政治上讲,现代索马里的边界是殖民瓜分的产物,泛索马里主义也是殖民主义遗留下的问题,因而,殖民主义才是问题的根源。但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确定了“边界不可变更”的原则后,殖民瓜分的边界作为一项遗产被非洲独立国家所接受。无论这项原则有多少漏洞,但它至少有效阻止了因边界纠纷而可能诱发的一系列边界战争。一旦允许所有居住着索马里人的土地全都归并到索马里国家,那将会刺激非洲其他跨界族群都采取同样的处理方式,非洲国家将因为边界纠纷永无宁日,这恐怕才是最大的灾难。正是基于此,本文的最终结论是,泛索马里主义的诉求是切实际的“空想”,它只有与恐怖主义相结合,才能在当代释放出一点影响,但最终必将是徒劳的。可行的出路则是,将泛索马里主义改造为局限于索马里国境内的、有限度的“索马里国族主义”,在整合现有国家方面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Abstract** Pan-Somalism was bred by the common lifestyle, language, and cultural belief of the Somalis. It was also bred by the impact of colonization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a common internal identity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colonial struggles. From 1948 to 1960, in the midst of anti-European colonialism movements and party-politics, the final goal of Pan-Somalism is established to achieve a unified and independent Somalia. From 1960 to 1969, in the name of anti-neighboring colonialism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Pan-Somalism strived to reach the dual goals of internal integration and external expansion. From 1969 to 1978, due to the combination of Pan-Somalism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Siad Barre Regime accordingly sought to build a greater Somalia by introducing the power of the USSR. From 1978 to 1991, Pan-Somalism came back to Clanism, seeking to reconstruct its own ideas and practices as well as fighting against the Siad Barre Regime. From 1991 to 2012, Pan-Somalism, by supporting Islamism, attempted to medi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clan with the same religion and to eliminate the internal division of Somalis by armed confrontations. Since 2012, Pan-Somalism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terroris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an Islamic State based on Sharia law in the Greater Somalia through terrorist attacks. Pan-Somalism shows the feature of nationalism, ye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hows the feature of trans-regional culturalism, which goes against nationalism. It even associated itself with terrorism. However, Pan-Somalism and terrorism are only making use of each other because the former has its own cultural rationality.

(王涛,副教授,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昆明,650091;赵跃晨,博士研究生,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200083)

[责任编辑:罗 薇]